

- **本期主题：中国实力及其在外交中的运用**
- **主题文章：**
 - 【英】Guy de Jonquières：世界权势转移与中国实力之辩
 - 陈志敏、常璐璐：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应改进自身权力资源的运用
- **经济外交评论：**
 - 门镜：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
 - 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谈经济实力在外交中的运用

本期主题：中国实力及其在外交中的运用

◎ 刊首语	04
◎ 文章概要	06
◎ 主题文章		
【英】Guy de Jonquières: 《世界权势转移与中国实力之辩》	12
陈志敏、常璐璐: 《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应改进自身权力资源的运用》	17
◎ 经济外交评论		
门镜: 《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	22
张晓通、王宏禹、赵柯: 《谈经济实力在外交中的运用》	26
◎ 经济外交官回忆录		
【英】尼古拉斯·贝恩爵士: 《经济外交官》	32
◎ 经济外交环球资讯	39
美国下任国务卿推行更加注重援助、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对外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日本央行最近加速印钞, 引发货币战担忧		
韩国三星道达尔石化(STC)决定恢复采购伊朗石油		
欧盟与美国自贸协定谈判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日本2012年全年贸易逆差创纪录		
韩国央行首次动用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安排		
中英两国央行准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 征稿启事	42
第三期主题: “中欧关系”		

《经济外交》编辑委员会成员



张晓通，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供职中国商务部，从事对美、对欧经贸业务。先后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布鲁日欧洲学院、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2004-2010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商务处工作。2011-2012年在商务部美国处工作。参与过中欧、中美、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外交、中美与中欧经贸关系。担任SSCI期刊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JCMS) 评审，出版《欧盟研究随笔》，在《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贸易》、《东北亚论坛》、《复旦国际关系评论》、EU-China Observer、Global Europe等国内外期刊、智库发表论文多篇。多次受邀前往经合组织、欧洲议会、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机构、高校发表主旨演讲、授课。



王宏禹，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高级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国经济外交、欧洲问题研究、中欧（经贸）关系、贸易决策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课题等若干研究项目；近年来在《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中、英文专著或论文集4部。



赵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代表作为《货币国际化的政治逻辑——美元危机与德国马克的崛起》、《货币的政治逻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等。曾获得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研究兴趣为货币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货币史、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等领域。

编委

刊首语

大家好！《经济外交》以“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为主题推出创刊号后，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研究员、外交学院副院长朱立群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双伍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教授、《外交评论》主编陈志瑞教授、商务部国际司司长尹宗华博士、世贸司副司长黄任刚、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吕录华参赞、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海关处刘健公参等多位领导的鼓励和帮助。同时也要感谢中国社科院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曲兵、广州大学沈本秋、天津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杨卫东等同行的关心与建议。我们会在这个领域持久地做下去，多发表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推动国内经济外交研究。

本期主题是“中国实力及其在外交中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实力的运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从政策和研究角度讲，这个话题时代感强，政策相关度较高，而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个人研究动力讲，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一是源于国家强盛后的自豪感，二是源于盛世之下的隐忧，三是源于同行的期待与鼓励。

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国人，这几年是一路兴奋、大踏步的走来。经济总量赶德超日，或许不日就将成为世界第一；神九飞天、蛟龙潜海，航母横空出世，真正实现了伟人“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豪情壮志。中国无论是军力、经济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但正如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诞生于其全盛时期，一个民族在兴盛之时的忧患意识是其继续前行的强大动力。虽然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中国目前还面临诸多内政外交的难题。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中，为什么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被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领土争议、能源威胁、金融安全、气候变化挑战、海上通道保障等一系列隐忧让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片刻不得懈怠。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在思索破解之道。在《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重大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张晓通和赵柯提到中国面临“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的悖论。在《谁说权力转移到了中国？》*一文中，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资深研究员Guy de Jonquières不认为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权力之巅，中国在成为全球领导者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布鲁日欧洲学院门镜教授在《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一文中，认为成为经济强国的中国还不是世界强国。

这些学者异口同声地问到，中国的实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力由哪些要素构成，中国发挥实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运用这些实力。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一文，可谓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擂响了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战鼓。而张晓通、王宏禹、赵柯的《论中

*2012年9月发表于《国际贸易》。

*详见http://www.ecipe.org/media/publication_pdfs/PB201103.pdf

*刊登于2012年第7期《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经济实力的运用》*一文则探讨了经济实力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国内损耗，以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时遇到的障碍。Guy de Jonquières继《谁说权力转移到了中国？》一文后又发表了前文的更新版本——《权力真的转移到了中国吗？》*，以怀疑和批判的目光看待全球权势自西向东转移、中国实力增长与权力使用效果等问题。

在同行们的期待和鼓励之下，本期《经济外交》以“中国实力及其在外交中的运用”为题，邀请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志敏教授、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资深研究员Guy de Jonquières和布鲁日欧洲学院门镜教授与我们共同探讨实力运用问题，刊登4篇分析评论文章以飨读者。这些文章分别是：

- 1、陈志敏、常璐璐，《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应改进自身权力资源的运用》；
- 2、Guy de Jonquières，《权力真的转移到了中国吗？》；
- 3、门镜，《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
- 4、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谈经济实力在外交中的运用》。

在实现民族复兴、追求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让我们怀着兴奋反思，带着理想忧患，做一个乐观满怀、理想升腾，但又诚实、务实、现实、踏实的思想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感谢所有为本期杂志付出辛劳的人们，也感谢所有关注我们杂志的朋友们！

《经济外交》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在《东北亚论坛》2013年1月号上发表。

*英文全文详见ECIPE网站：http://www.ecipe.org/media/external_publication_pdfs/Guy_JED.pdf



文章概要

现将本期四篇文章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如何看待中国的实力？

必须予以客观和冷静地看待。一百年前，在美国快要成为超级大国的时候，它已经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子上稳坐了10年；那时，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是当时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和英国经济总量之和的两倍。即使按照最慷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今的GDP也只占到那时美国的三分之二（按名义汇率算，约低了一半）；且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会逐步放缓。此外，一百年前，美国的人均收入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比它最大的对手英国高出10%。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只占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按名义汇率计算只占十分之一），世界排名约到第90位。与那时的美国相比，中国仍只是世界上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二、中国实力主要由哪些要素构成？

实力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包括军事、经济实力；软实力包括外交、制度、文化等。中国目前最主要也是最好用的实力资源是经济实力，尤其是国内市场的力量。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已经为世界的主要原材料、农产品、高端制成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兴市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形成对中国日益上升的依赖程度，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谋求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三、中国在运用经济实力时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经济规模无法自动转化为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达到了顶峰；但它的这种经济优势从来没有被转化成为与之等量的政治或外交影响力，更不用说是领导力了。

对经济实力无法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解释很多。一种是认为外部环境恶化，尤其是美欧等国内保护主义上升，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还有一

*为阅读方便，不再一一列举每个观点的作者姓名。

种解释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包括过分依赖出口导致在相互依存过程中的脆弱和敏感。第三种解释认为中国缺乏运用经济实力、发挥领导力的意愿和态度。第四种解释是经济实力在国内转化和跨部门流动过程中出了问题。

所谓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是指不同部门间出发点和目标不统一、利益群体的出现和民众声音的渐强导致实力资源在国内环节的损耗愈发明显。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大规模的市场开放和经济体制调整阶段已经结束。这就给如何运用国内大市场这一实力资源开展经济外交带来挑战。只有在大规模开放市场或显示存在这一潜力和清晰轨迹的时候，经济外交谈判才能换取对方的对等开放。事实上，当前对外经济谈判面临的很多困难急需新的开放来解决。而美欧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形势萎靡，保护主义大幅上升，也给中国与这些经济体探讨双向新的开放构成了阻碍。

经济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困难。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以撼动其他大国，因此中国可以倚重的实力资源主要还是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外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经济实力争取安全利益的实现，即通常所讲的“以经促政”。以中国争取西方国家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为例，中国尝试动用的实力资源主要是扩大进口，加强同主要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合作，即通过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来换取美欧在出口管制这一安全问题上的让步。但美国将放松出口管制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是高级政治，而将经贸问题视为低级政治。以经济合作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在推动西方国家放松出口管制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做出新的更大的努力。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要想让经济实力资源从经贸领域流入到国家安全领域，推动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似乎难度不小。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的结果相符，是有着现实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日本、德国甚至欧盟都很难真正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原因。

四、中国实力运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实力运用的目的可以分为塑造和防御两个大类。塑造指的是一个行为体运用实力改变其他行为体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并试图建立反映本方诉求的国际秩序和其他行为体的国内秩序，是一种向外塑造。防御则主要是一个行为体通过实力的运用来防止其他行为体采取损害本方利益的

对外行为，是一种对外防御，不涉及改变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国内行为以及不损害本方利益的其他对外行为。防御和塑造的差别揭示了一个国际行为体在权力运用方面的内向性和外向性之分、防守性和进攻性之别。

中国实力运用战略重防御而少塑造。从与欧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防御性较强，大于欧盟，但小于美国。中国的塑造性在三方中最弱。中国对权力的使用方式倾向于吸引而不是强制，这是中国和平外交传统的使然。中国在实力运用战略方面倾向于防御说明了中国对国际机制、国际条约有一定的参与，但是仍然很重视主权的完整性。另外，中国外交缺乏塑造性的特点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较弱，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仍然不高。国内学者方长平在谈到中国软实力的目标时认为，中国希望通过软实力达到的最主要的因果性目标是在周边和全球层次上缓解“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理解，使其接受并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扩展到世界，内化并改变他国的身份。所以说，中国实力运用目的当中，对外防御强于对外塑造。

五、中国该如何运用实力？

1、中国要逐步扩大自身权力资源的对外塑造功能。

第一，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实践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实践表明，中国主张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正在遭遇重要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在继承外交传统的同时发展出有新意的外交思想，从而继续占据外交的道义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的软性软权力。

第二，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中国应致力于发展相应的军事硬实力资源，特别是远程力量投放能力，强化国际维和和人道救援能力，提升国际军工合作水平，增加军事对外援助。

第三，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考虑到当前世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强化防范和制衡的态势，这也迫使中国有必要适度发展权力资源的强制性运用能力，对强权政治和制衡行为进行有效的反制。这涉及发展有效的军事威慑、经济与外交反制、制度制衡与舆论反击能力。

2、针对经济实力资源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跨部门流动困难，我

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提高经济实力运用的效果：

一是明确国家利益。之所以出现经济实力转化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关键是在国内进程中有关各方无法达成共识。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利益群体和民众当中多元利益和不同声音的出现，令国家利益越来越难以界定，模糊了经济外交努力的大方向。有鉴于此，应考虑成立国家利益委员会，研究中国在进一步融入世界过程中的国家利益问题，对其进行细化分类，指出什么是根本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定期出台《中国国家利益报告》，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决策时参考。在明确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有开放的渠道供不同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反映相关利益诉求，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国内各方达成共识，明确国家利益，对外谈判时才能统筹资源、攻守有度。

二是运用战略。明确国家利益和目标之后，就应该运用各种实力资源及其组合达成这些目标，这就是战略制定。从实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和具体效果，中间需要战略、策略和手段。除了美国人倡导的“大战略”和“巧实力”这些宏观性战略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具体的战略，或者说是策略可用。例如“联系战略”，将议题A和议题B联系起来考虑，进行利益置换。中方可以考虑与主要贸易逆差国开展经济合作，扩大进口，通过共同努力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这些国家应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松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管制，方便中国企业前往投资，为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这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联系战略。中国也可以考虑采用各方在WTO内部的谈判模式，即将多项议题组织起来，进行“一揽子谈判”（single undertaking），实施“大交换”（grand bargain）。这样有助于实现利益总体平衡，对跨国谈判过程中国内利益受损的部门和团体进行补偿，从而有利于国内达成一致，并提高谈判的效率。

三是加强内部协调。在明确国家利益和制定战略过程中，关键是做好内部协调。一种方法是自上而下，从总体外交的高度出发，妥善处理总体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系，既不能唯经济利益论，也不能单纯强调为了外交利益就应该牺牲经济利益，而应辩证看待国家利益并予以细化。同时加大在经济领域的内部协调力度，通过各领导小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制度等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实力资源，统一对外谈判立场。二是自下而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与世界关系的大

讨论，以形成新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共识，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实力资源只有通过内外兼通的路径，才能稳步积聚和有效利用。

四是加强对外战略机制和平台建设。在与国外互动过程中，通过设立机制化平台，创造性地解决各类实力资源如何配合的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是朝向实现经济资源与战略、政治资源有效整合的重要步骤，为中美双方的高层官员共同管理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平台。但目前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尚不能有效整合各类实力资源，战略轨道与经济轨道尚没有完全对接。为了推进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在元首层面达成战略共识，再交由战略与经济对话具体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应实现政治与经济议题的结合，实现全面的有取有予。与此相类似，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会晤机制等都是具备将各类实力资源整合使用的潜在平台和机制，但需要不断改进完善，尤其是通过内部协调，明确国家利益，统一谈判立场，加强对外沟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上述战略机制将发挥基础性的平台作用，而战略机制的动力源泉依然是明确国家利益、凝聚国内共识、整合实力资源、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利益置换。

六、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1、明确中国想领导的方向。但中国目前表现出来的雄心方向不清。一方面中国对现存的国际机制和结构心存疑虑，认为过多地为西方所塑造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没有直接出面挑战或削弱这些机构机制，而是选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规则来遵守，而且中国也没有另起炉灶，提出一套新的、可信的和可替代现有秩序的新世界秩序观。中国仅仅要求获得别国尊重，并允许其实现中国自身的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知道或至少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但中国自己似乎不太知道他想从世界得到什么，只是比较清楚自己不要什么。这给别国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增加了难度。

2、有一批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尽管他们经常对你提出批评。但美国的盟友大体上视他们跟美国是站在一边的，并经由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历史联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密切、稳定的国际

盟友却屈指可数。

3、需要别人的信任。但中国恰恰遭遇双重的信任赤字。一方面，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不少国家缺乏信任，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则因为中国政府体制的不透明、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以及中国时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缺乏信任。这些都限制了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努力，而软实力又基于一国的价值观、理想和生活水平能够让别的国家接受并憧憬，这些中国都还比较欠缺。

4、愿意承担重大责任。领导国家必须敢于接受政治、金融和经济上的代价，超越短期国家利益，坚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利益。但是目前的中国，纠结于国内迫近的各类挑战，没能表现出愿意承担重大责任的充分意愿。其依然内顾，而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则压倒性地为其国内重点和利益所左右。

主题文章

权力真的转移到了中国吗？

Is Power Really Shifting to China?

【英】Guy de Jonquières¹

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力量正在发生自西向东的移转——这几乎成了我们时代的魔咒。人们不厌其烦地谈论它，重复它，众口铄金，它似乎变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权力转移的话题又总是和中国崛起的讨论如影随行。人们断言：中国正在通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飞速前进；中国统治世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人们很少过问，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能统治世界，其实力由哪些要素构成，中国如何运用这些实力，中国发挥实力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目的。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增速显著；然而，单凭这一点就认定，它一定具有统治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这种判断显然太过武断。

如何看待中国实力

不可否认，近30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带给了中国惊人的经济规模。现在，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同时，按某些标准衡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最重要的加工厂。中国拥有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其外汇储备规模高达3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中国还是全世界铝、铁矿石和铜的最大消费者。

但是，对中国取得的这些经济成就，必须予以客观和冷静地看待。一百年前，在美国快要成为超级大国的时候，它已经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子上稳坐了10年；那时，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是当时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和英国经济总量之和的两倍。即使按照最慷慨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今的GDP也只占到那时美国的三分之二（按名义汇率算，约低了一半）；且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计会逐步放缓。此外，一百年前，美国的人均收入也是全世界最高的，比它最大的对手英国高出10%。经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中国今天的人均

¹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英文全文详见ECIPE网站：http://www.ecipe.org/media/external_publication_pdfs/Guy_JED.pdf

收入，只占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按名义汇率计算只占十分之一），世界排名约到第90位。与那时的美国相比，中国仍只是世界上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而且无论如何，经济规模都无法自动转化为一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达到了顶峰；但它的这种经济优势从来没有被转化成为与之等量的政治或外交影响力，更不用说是领导力了。两个世纪以前，中国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一国的GDP比整个西欧都高，但那时的中国却基本与世隔绝。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至少部分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的经济实力及其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当欧洲自身出现了经济麻烦又指望中国施以援手的时候，中国是不会再像从前一样，让西方像老师教训学生一般，对自己的行为指指点点了。

中国从容走出经济危机这一事实激发了中国在国际上更大的自信，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傲慢。从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北京都更加大胆地对自己的立场加以坚持。如果说中国曾经有过迫于外来压力而改变政策的时候，那么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大大减少了。事实上，现在有人经常指责中国在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对其邻国施压。

但在多大程度上中国过分自信的举动是出于其自身实力的增长，还是源于西方影响力的下降？对于这一点，各家都有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最近的做法与过去截然不同。特别是近三年来，中国外交态度发生了陡然转变。过去是让别人放心其崛起是和平、和谐的，但现在开始在海外彰显实力，有时甚至非常强硬。但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寻求与日本及其他政治对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去年秋天同意启动与日本、韩国的三边自贸区谈判，以及创建一个包括16个国家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造成此种令人困惑的外交态度转变的准确原因，目前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正在实施一种奇怪的具有双重性和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一部分是基于冷静的理性主义，另一部分则是基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态度。也许，中国就是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无论哪种，中国都会给人一种举棋不定、目标混淆、对自身在世界上的定位不清的模糊印象。

中国发挥全球影响力的三大实力基础

现实中，中国发挥全球影响力的实力基础有三：一是说“不”的实力。不要小看这一实力。中国的经济力量使得中国是否愿意合作的态度取向，哪怕就是点个头都显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倡议和主张，不论是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还是朝鲜半岛局势或中东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在西方处于经济衰退、自信下降、缺乏领导力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二个实力基础是中国厚厚的支票簿。这能给中国买来影响力，特别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尤其如此。但由此而来的慷慨并非中国独有，其能带来的政治效果也不一定令人满意。以日本为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多年来投入了大量的援助和投资，但无论是在交朋友还是发挥影响力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中国巨大的金融资源也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金矿，无法无限制地使用以实现其海外政治利益、推进议事日程。

第三个，看起来也是最有效的实力基础就是中国的国内大市场。北京越来越乐于使用市场的力量来与外国政府和公司谈判。中国将外国公司能否进入中国与购买先进技术挂钩，容忍老百姓抵制日货的行为，并且灵活的对欧洲国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防止他们形成对华统一阵线。

然而这些策略也有其局限性。其中一些会直接或间接的让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付出代价，比如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情绪。此外，强制性地限制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也不符合中国刺激内需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签署的一系列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的贸易自由化理念。最后，市场力量带来的谈判优势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密切相关。一旦中国经济如不少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几年中出现停滞，中国的这些谈判筹码也会随之迅速贬值。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原先认为是中国重要实力基础的资源也多有夸大，其中一些实际上还造成了中国的脆弱性。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其中一例。这些巨额外汇储备被不少人视为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但上述观点显然无法得到中国富裕阶层的认同，中国的不少富人对未来的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都有显示，每年富裕的公民个人都会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而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百万富翁中，超过半数都想移民国外以获得更好的生活。

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部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成就，但也可以看作是经济表现被政策扭曲之后的产物。本世纪初，净出口收入和资本流动使得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累积了大量的盈余，中国外汇储备价值也随之膨胀。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还是结构性的，即中国的国内储蓄长期高于投资。换言之，国家收支盈余是在压低国内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取得的。导致中国高储蓄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政府无力向国有企业征税和取得分红、政府自身储蓄率过高等等。中国对这些问题了然于心，但改变只能循序渐进。

对中国自身建设而言，外汇储备不过是一堆死钱，它对国内的繁荣没起到半点作用。事实上，中国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它们被兑换成为人民币，就会抬高国内的通胀水平和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压力——而这二者都不是中国政府喜闻乐见的。于是，中国政府只得将它们用于海外投资。

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在上述背景条件下，中国成为未来全球领导者的前景如何？中国又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领导者？显而易见，中国不可能成为像美国在二战后成为的那种全面和无人挑战的领导者。二战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二战后充当的那种全球霸主型领导者无可复制。但中国可以考虑提出建设性的和有想象力的全球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裨益，从而获得全球其他国家的支持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但任何有效的领导国家都需要具备几项前提条件：

首先是要明确你想领导的方向。但中国目前表现出来的雄心方向不清。一方面中国对现存的国际机制和结构心存疑虑，认为过多地为西方所塑造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没有直接出面挑战或削弱这些机构机制，而是选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规则来遵守，而且中国也没有另起炉灶，提出一套新的、可信的和可替代现有秩序的新世界秩序观。中国仅仅要求获得别国尊重，并允许其实现中国自身的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知道或至少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但中国自己似乎不太知道他想从世界得到什么，只是比较清楚自己不要什么。这给别国与中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增加了难度。

其次，做成功的全球领导者需要有一批心甘情愿的追随者。尽管他

们经常对你提出批评。但美国的盟友大体上视他们跟美国是站在一边的，并经由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历史联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密切、稳定的国际盟友却屈指可数。

第三，成功的国际领导者需要别人的信任。但中国恰恰遭遇双重的信任赤字。一方面，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不少国家缺乏信任，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则因为中国政府体制的不透明、对中国意图的不确定以及中国时常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中国缺乏信任。这些都限制了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努力，而软实力又基于一国的价值观、理想和生活水平能够让别的国家接受并憧憬，这些中国都还比较欠缺。

第四，愿意承担重大责任。领导国家必须敢于接受政治、金融和经济上的代价，超越短期国家利益，坚信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利益。但是目前的中国，纠结于国内迫近的各类挑战，没能表现出愿意承担重大责任的充分意愿。其依然内顾，而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则压倒性地为其国内重点和利益所左右。

上述挑战的解决要求中国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一决策的过程比中国所习惯的更困难、更复杂。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制定因时制宜的短期策略和满足对资源即时需要，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还必须具备更宽广、更长远的视野。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已向世界表明，它能为世界秩序带来震动。但中国能否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站上世界权力之巅，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摘译：张晓通）

主题文章

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应改进自身权力资源的运用*

陈志敏、常璐璐*

一、重新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从“资源”的维度出发，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它可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物质性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力量；非物质性的权力包括外交、制度、文化。从“运用”的维度出发，笔者将权力资源的运用方式分为强制和吸引两大类。强制性的方式包括制裁和敌对。在这里，制裁旨在通过剥夺其他国际行为体的部分物质与非物质利益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敌对则试图剥夺对方全部的利益，推翻妨碍本国利益和政策目标实现的他国政府。另外，我们也可将威慑视为最低程度的强制方式，它以制裁或敌对的威胁使用来迫使其他国际行为体不做不利于本方的事情。吸引性的方式包括互惠和予惠。其中，互惠是指一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发展出互利的合作关系。由于互利关系的存在，如对称性相互依赖的形成，互惠当事方由于共同利益的吸引而趋向维护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并对另一方损害本方利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能力。在予惠的情形下，一国由于给对方带来了额外的利益（如提供各种援助），形成了他方对本国在安全与经济方面的依赖。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外交、制度和文化能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意图和行为产生塑造性的影响。

图1将权力的资源放在横轴上，将权力的运用方式放在纵轴上，它的四个象限可以代表四种不同的权力模式。从右上象限开始，逆时针方向分别为软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硬性硬权力、硬性软权力。

其一，软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上象限的权力称作软性软权力，或“软实力的软使用”，这也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软权力。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非物质性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在互惠的层面，在文化交流中以文化为媒介，通过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实现本国与他国的沟通。而在予惠的层面，权力的实施方一般会单方面给予对方好处，以此来达到其更高层次的吸引力（如提供外交支持、培育主流制度和主流文化等）。

*本主题文章根据陈志敏教授等在2012年第7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一文改写。

*作者简介：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让·莫内讲座教授；常璐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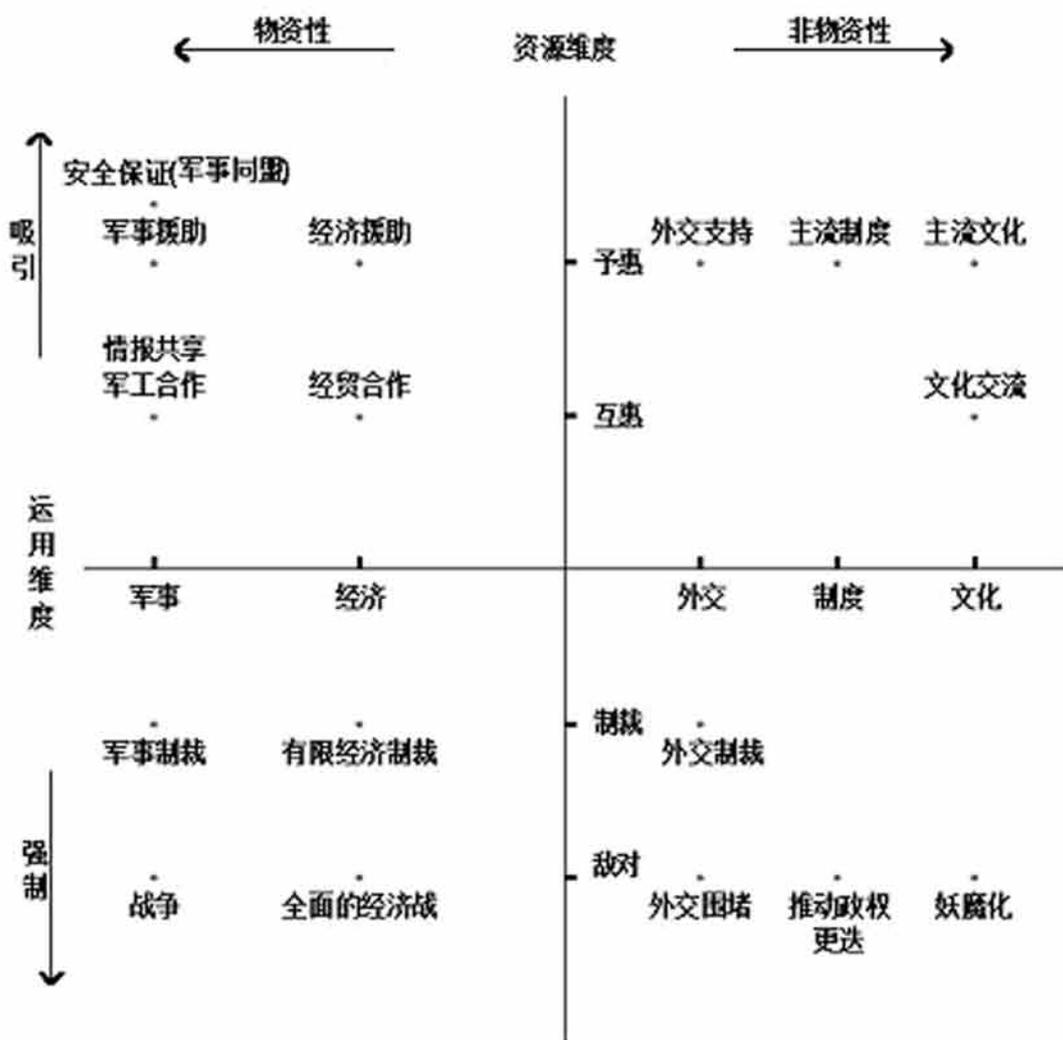


图1 权力的分类

其二，软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上象限的权力称作软性硬权力，或“硬实力的软使用”。这一类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的资源，运用吸引性的方式发挥影响。硬实力不只产生强制力，它也可以产生吸引力，例如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经贸合作、军工合作等。军事和经济力量只是权力的物质来源，并不必然产生强制性或吸引性的作用。“经济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化为软权力，既可以用制裁来强制他国，也可以用财富来使他国软化”。²同样，在灾难救援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强大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以提升一国的国际形象。硬实力的软使用已被中国学者所关注。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硬实力的作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硬实力由硬使用转向软使用。作为权力运用的大局规划和策略，硬、软实力的正朝着软使用方向发展是一种合乎时代潮流的方式。³

²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0页。

³高兰、俞正棣：《实力战略的变革：硬战略抑或软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第2页。



其三，硬性硬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左下象限的权力称作硬性硬权力，或“硬实力的硬使用”。这种权力的特点是，它一般使用物质性资源，并且运用强制性的方式施加影响。这其中包括了战争（暴力的最高形式）和全面经济战，也包括了低烈度的军事制裁、有限经济制裁等形式。

其四，硬性软权力。我们把坐标系中右下象限的权力称作硬性软权力，或“软实力的硬使用”。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权力使用方式，它一般使用非物质性、软性的资源，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发挥影响。外交强制表现为外交制裁、外交围堵等。制度强制包括推动政权更迭，如通过扶植反对派来瓦解现有政权的颜色革命。文化强制表现为宣传战，通过“抹黑”或“妖魔化”一个国际行为体来达到破坏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合法性的目标。

二、中国应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

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主要依靠经济硬权力资源和各种软权力资源（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运用；其对外防御强于向外塑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介入日益深入，中国有必要在各方面改进中国的权力战略，首先就是要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具体而言，中国应更为有效地发挥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对外投资和援助的吸引力。

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已经为世界的主要原材料、农产品、高端制成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兴市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促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形成对中国日益上升的依赖程度，并且推动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谋求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也在高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88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 172亿美元，居全球第17位；中国在世界178个国家（地区）拥有1.3万家境外企业。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 750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即将进入大规模拓展周期。⁴在对外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 655.7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年底的31 811.5亿美元，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⁵投资在美国和欧盟国债的中国外汇储备资产虽然蒙受着美欧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贬值风险，但也让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的金融依赖，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⁴姜建清：《中国对外投资将进入大规模拓展的周期》，载《中国经济导报》，2011年12月31日。

⁵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历年外汇储备》，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index.html。



在未来时期，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但需要科学地调整对外援助国别布局，将援助重点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倾斜；完善援助项目结构，增加受援国急需、当地人欢迎、受惠面广的医院、学校、生活供水等民生项目以及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太阳能、沼气、小水电等清洁能源项目；积极推进援外方式创新，实现成套项目等“硬援助”与人力资源开发等“软援助”协调发展。⁶

三、中国要逐步扩大自身权力资源的对外塑造功能

第一，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实践以及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实践表明，中国主张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正在遭遇重要的挑战，中国外交需要与时俱进，在继承外交传统的同时发展出有新意的外交思想，从而继续占据外交的道义制高点 and 话语主导权，维护和加强中国外交的软性软权力。

根据斯科尔科沃-安永研究所 (Skolkovo-E&Y Institute) 推出的2010年各国软实力排名榜，美国以87分高居软实力榜首，法国以及德国则紧随其后。而中国则以30.7分排在软实力榜的第8位，与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主要得益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目度，不断发展的旅游业以及大学的迅速扩张与排名的提升。而在其他的指标方面，如吸收移民、传媒出口、明星影响力、政治自由、法制、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等方面，排名则较低。⁷为此，中国应针对性强化有关的弱项，在未来几年中积极加强文化软权力的建设。

第二，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2012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6503亿元，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年度国防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家。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中国应致力于发展相应的军事硬实力资源，特别是远程力量投放能力，强化国际维和和人道救援能力，提升国际军工合作水平，增加军事对外援助。

第三，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考虑到当前世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强化防范和制衡的态势，这也迫使中国有必要适度发展权力资源的强制性运用能力，对强权政治和制衡行为进行有效的反制。这涉及发展有效的军事威慑、经济与外交反制、制度制衡与舆论反击能力。

⁶陈德铭：《努力开创援外工作新局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精神》，载《求是》2010年19期，第44页。

⁷Peter Johansson, Seung Ho Park and William, “the rising soft power of the emerging world,” FT.com, December 19, 2011. <http://blogs.ft.com/beyond-brics/2011/12/19/guest-post-soft-power-in-the-emerging-world/#axzz1qH7ZK1TF>



对外防御，抵御外部世界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企图，保证中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稳定外部环境，这仍然是中国权力战略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期待以及中国利益的全球性扩展，中国的权力战略也要服务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对外塑造功能。

（赵柯编辑整理）

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

门镜*

【概要】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成就，很多权威机构开始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强国不等于世界强国。本篇文章将具体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路任重而道远。

【Summary】China's more than thirty years' reform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Many influential institutes predict that China would be the number one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an economic power is not a world power.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 reasons and point out that it will take some time for China to become a world power.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成就，很多权威机构开始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影响力也在快速上升。无论是地区事务还是世界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意中国的声音。中国与其部分邻居的领土争议今日来成为世界媒体焦点。从世界安全与稳定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保护，中国无处不在。各主要媒体对“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的连篇累牍的报导表明中国的内部发展也已成为世界的关注。“中国”二字每天都会因为不同的内容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上。但是，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崛起不太一样。世界强国是指那些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国家。中国的崛起虽然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即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中国还不是世界强国。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目前，虽然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在世界上只排在九十名以后。而且，地域分配上的东西部差距和区域发展上的城乡差距都是亟待着手解决的问题。最为困扰中国整体发展的问题是收入上的贫富差距。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使四亿人摆脱贫困，中国科学院最新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指出，按

*门镜，布鲁日欧洲学院教授。

去年的的贫困标准，中国仍然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最近的一次由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而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基尼系数0.4则已经是警戒线。消除贫困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东西部差距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面临很多内部挑战，包括政治及经济改革方面的和环境方面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向前发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科学发展”，从先发展后治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治理环境与改善民生并举，中国一直在摸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比较复杂。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处理直接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如何避免民族分裂，有效的促进民族融合和团结是一大挑战。台湾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对中国发展有着战略性的影响。在当下，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维持稳定和长治久安，不但要考虑经济发展速度，更要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且，要兼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发展动态，找到一条平稳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中国周边环境过于复杂，不但需要出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智慧，而且需要维持内部发展与外部关系的平衡，需要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协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不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成为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的颇具影响力的成员。虽然总的来讲，中国面临着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十分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内部的决策和发展。近些年来，中国已经成功与很多邻国达成边界谈判协定，尤其是陆路边界的谈判。中国周边的海洋地区，蕴藏着大量的自然能源和水产资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的迅速增长，近海的能源开展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前景。由于菲律宾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以及日本在东海的挑衅行为，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海洋领土争议为世界所关注。而美国最近重返亚洲的政策更加剧了地区矛盾，使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议国际化。中国历来主张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但是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问题上，情形非常复杂，既涉及双边问题，也涉及多边问题，既是地区问题，也是国际热点。如何在复杂和困难的形势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极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智慧。

第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上升的力度与速度。由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中国近些年来加强了与世界很多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与某些国家关系的发展证明经济外交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经济外交也有其局限性。对外经贸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但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联系并不能完全帮助双方化解政治分歧。在某些情况下，经贸的摩擦甚至使政治关系更加棘手和敏感。由于其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独具特色，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坚持求同存异。但是，“存异”并没有消除异议。搁置争议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回避争议。而且，由于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不同，中国在上世界上真正的朋友并不多。如何使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多国家真心的拥护是提高中国地位和影响的关键。另外，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将直接挑战美国固有的地位。如何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与其发展真正的建设性的关系，是另一个挑战。只有中国把同美国的关系理顺，使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放心，中国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在地区事务还是国际问题上，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第五，即便中国的硬实力达到世界第一，软实力的建设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如何使西方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的体制和思想价值体系，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任务。中国的硬实力建设，尤其是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已经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注意和不安，其根本原因是彼此战略互信的欠缺。使这些国家信任和理解中国，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软实力的发展，是要把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体制和思想用西方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传播出去，使西方政府和民众逐渐了解中国并真心承认中国模式的魅力。而要改变西方的看法，不是短期的努力可以完成的目标。这不但是中国政府外交的工作，更是民间外交的任务。更具体地讲，除了政府和民间的对话与交流，媒体的作用不可低估。西方很多对中国“妖魔化”的报导都来自于新闻媒体。因此，更多的工作在于如何改变西方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而这不仅与对中国报导的传播方式和手段相关联，更与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建设紧密联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平衡以及中国如何发挥更大影响力的问题。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不仅得益于中国政府制定的正确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也得益于和平的外交环

境和目前的国际体制为中国发展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只想享受更多权利不想履行更多的义务的批评未免偏颇。中国随着国力的上升确实在国际社会履行更多的义务，但是如何定义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由谁来定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直接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相关。而在国际社会是否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则直接与中国的软硬实力相关。换句话说，中国虽然还不是世界强国，但中国的实力不可低估。面对日益上升的实力如何调整现有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时俱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也是当下应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路任重而道远。

谈经济实力在外交中的运用*

张晓通、王宏禹、赵柯*

【摘要】中国近年来并未因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在对外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反而在国际政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成为了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愈加尖锐的矛盾。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未充分利用，没有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受阻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只有明确国家利益，综合运用大战略和策略，加强内部协调和对外战略机制建设，经济实力才可能得以有效运用和发挥。

【Summary】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has been caught up in a new dilemma - having unprecedentedly rich power resources, but fac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ituation.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lies in the increased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economic power resources into concrete results. The erosion of power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domestic process and the difficulty of transporting power resource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in translation of power resources. Only by clearly delineating national interests, comprehensively employing both grand strategy and tactics, more closely coordinating internally 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strategic dialogue mechanisms can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be properly wielded.

在中国现实的经济外交实践中，存在着愈来愈尖锐的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之间的矛盾。本文拟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实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的使用效果。

一、中国经济实力无法充分运用的原因

近年来，虽然中国国际影响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中国所掌握的实力资源与其应有的影响力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性。迄今为止，中国依然没有被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多哈回合谈判、中国与澳大利亚、海湾合作组织等自贸区谈判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稀土

*本评论根据张晓通等在《东北亚论坛》2013年1月号上发表的《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一文改写。

*张晓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宏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赵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等大宗商品领域还缺乏决定性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企业走出去频遭安全审查，导致并购失败。

对这些挫折的解释有许多。一种是认为外部环境恶化，尤其是美欧等国内保护主义上升，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包括过分依赖出口导致在相互依存过程中的脆弱和敏感。第三种解释认为中国缺乏运用经济实力、发挥领导力的意愿和态度。这三种提法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和一个侧面提出了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中国遇到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经济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够或者运用实力意愿不足的问题，而是经济实力在国内转化和跨国流动过程中出了问题。

（一）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

不同部门间出发点和目标不统一、利益群体的出现和民众声音的渐强也许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这也为在新时期开展经济外交增添了新的难度。在旧有体制调整亟待推进之际，上述现象的出现导致实力资源在国内环节的损耗愈发明显。

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最丰富的实力资源是国内巨大的市场及其增长潜力。这对经济萎靡不振的美欧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有步骤、以利益置换为导向、逐步开放国内大市场则可以转化为可观的权力结果和影响力。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从1986年中国开始复关谈判到2006年入世过渡期结束的这二十余年时间里，中美经贸关系之所以发展迅猛，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达成了一项战略共识，即相互确保市场开放、两国企业绝对收益的持续增长和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这一战略共识支撑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长达二十年之久。但现在无论是在中美、中欧双边经贸关系的处理上，还是在推进多哈回合和几大自贸区协定谈判过程中，不同政府部门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有的部门强调开放，有的强调保护。客观来讲，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大规模的市场开放和经济体制调整阶段已经结束。这就给如何运用国内大市场这一实力资源开展经济外交带来挑战。只有在大规模开放市场或显示存在这一潜力和清晰轨迹的时候，经济外交谈判才能换取对方的对等开放。事实上，当前对外经济谈判面临的很多困难急需新的开放来解决。而美欧等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形势萎靡，保护主义大幅上升。这给中国与这些经济体探讨双向新的开放构成了阻碍。

民间压力也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经济外交中的一大影响因素。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不仅仅是欧洲缺乏资金流动性，中国温州也因资金链条断裂而陷入一场民间信贷危机，一些企业关门倒闭。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民间骤然出现了“先温州后欧洲”的舆论压力^[8]，给中国领导人决策增加了新的考虑因素。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这一平常的援外活动竟也引发网上热议。一位网友表示：“援助别人我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坐的却是报废车，严重超载的面包车！”^[9]这些民间压力给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外交和内政是否会成为矛盾的对立面？是“内政优先”还是“外交优先”？是“国内优先”还是“国外优先”？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当前争论本身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投放构成了一定的钳制。

（二）经济实力资源的流动性困难

由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以撼动其他大国，因此中国可以倚重的实力资源主要还是经济实力。中国经济外交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经济实力争取安全利益的实现，即通常所讲的“以经促政”。以中国争取西方国家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为例，中国尝试动用的实力资源主要是扩大进口，加强同主要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合作^[10]，即通过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来换取美欧在出口管制这一安全问题上的让步。但美国将放松出口管制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是高级政治，而将经贸问题视为低级政治。以经济合作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在推动西方国家放松出口管制这一问题上还需要做出新的更大的努力。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要想让经济实力资源从经贸领域流入到国家安全领域，推动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似乎难度不小。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的结果相符，是有着现实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日本、德国甚至欧盟都很难真正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原因。

现实中，经济实力资源的流动还受制于国内不同目标之间的竞争。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利益的排序问题。是不是经济利益一定要服从政治与安全利益？如果是，经济实力资源就应该无条件地牺牲以换取政治与安全利益。例如在利比亚撤侨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中国工程人员的人身安全，及时将其撤回国内，从而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这是一个政

^[8] 白明. 先救欧洲，还是先救温州？2011年10月7日 [EB/OL].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04-25141.shtml

^[9] 凤凰网. 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引发网上热议2011年11月27日，[EB/O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gsyeyxiaochechehu/content-3/detail_2011_11/27/10929244_0.shtml

^[10] 新华网. 胡锦涛：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11年12月11日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12/11/c_122406371.htm



治考虑优于经济考虑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国家动用（和牺牲）了经济资源，最终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目的（人员安全）。但欧洲一位研究人员则从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发现，“实践中，中国为实现单纯政治目的而对其经济影响力加以利用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且即使中国有打算这样做，结果也常常不遂人愿。在大部分场合，中国的表现都更像是个不愿出钱的出纳员：比起利用其经济实力换取地缘政治上的优势，中国显然对其出资能否实现相应的回报，更加在意”^[11]。从上述两个对立的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目标孰先孰后、总体外交与经济外交是什么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政促经”还是“以经促政”。只有在明确了目标的先后顺序之后，才能确定经济实力资源与其它领域实力资源如何配合。在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经济资源主要服务于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整体外交目标。而在邓小平及其后时期，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的位置前移，经济目标与外交目标孰先孰后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事实上，中国当前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中国会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和观察。

二、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实力运用的效果

针对上述经济实力无法有效运用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提高经济实力运用的效果：

明确国家利益。之所以出现经济实力转化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关键是在国内进程中有关各方无法达成共识。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利益群体和民众当中多元利益和不同声音的出现，令国家利益越来越难以界定，模糊了经济外交努力的大方向。有鉴于此，应考虑成立国家利益委员会，研究中国在进一步融入世界过程中的国家利益问题，对其进行细化分类，指出什么是根本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定期出台《中国国家利益报告》，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决策时参考。在明确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有开放的渠道供不同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反映相关利益诉求，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国内各方达成共识，明确国家利益，对外谈判时才能统筹资源、攻守有度。

运用战略。明确国家利益和目标之后，就应该运用各种实力资源及其组合达成这些目标，这就是战略制定。从实力资源转化为影响力和具

^[11] [英] Guy de Jonquieres. What power shift to China? [J] ECIPE Policy Briefs, No. 04/2012.

体效果，中间需要战略、策略和手段。除了美国人倡导的“大战略”和“巧实力”这些宏观性战略之外，其实还有许多具体的战略，或者说是策略可用。例如“联系战略”，将议题A和议题B联系起来考虑，进行利益置换。中方可以考虑与主要贸易逆差国开展经济合作，扩大进口，通过共同努力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这些国家应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松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管制，方便中国企业前往投资，为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这就可以理解为一种联系战略。中国也可以考虑采用各方在WTO内部的谈判模式，即将多项议题组织起来，进行“一揽子谈判”（single undertaking），实施“大交换”（grand bargain）。这样有助于实现利益总体平衡，对跨国谈判过程中国内利益受损的部门和团体进行补偿，从而有利于国内达成一致，并提高谈判的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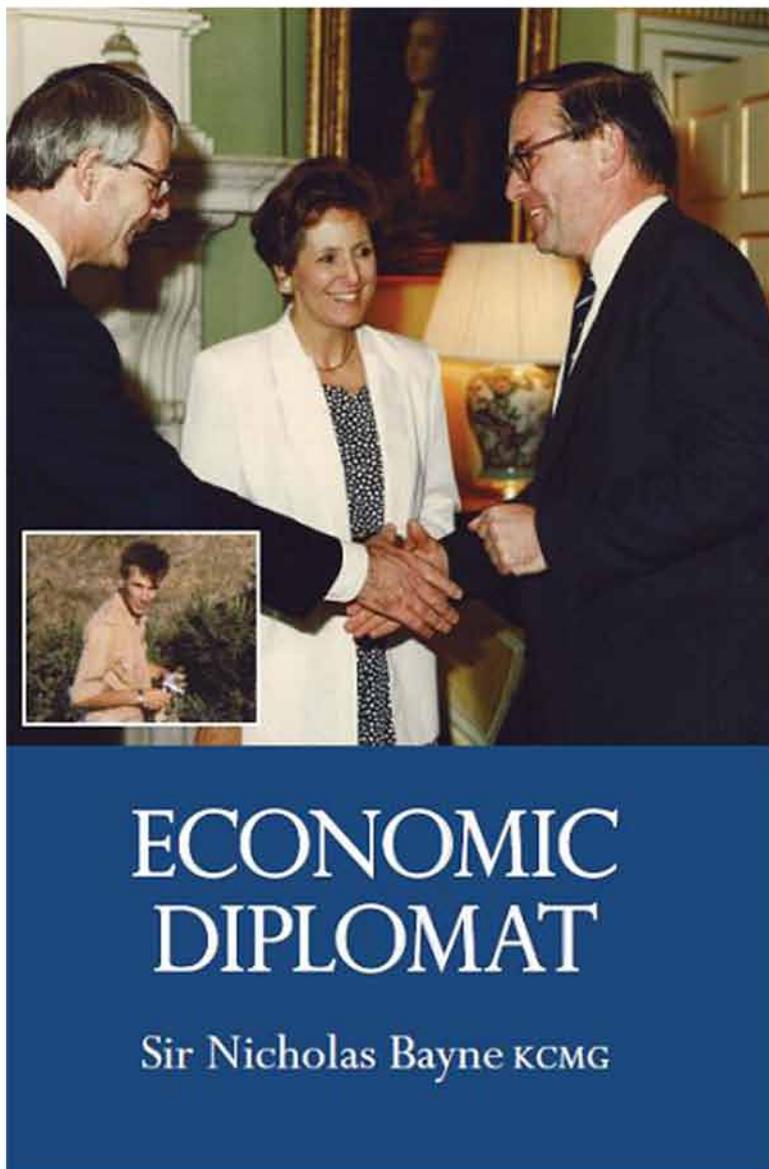
加强内部协调。在明确国家利益和制定战略过程中，关键是做好内部协调。一种方法是自上而下，从总体外交的高度出发，妥善处理总体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系，既不能唯经济利益论，也不能单纯强调为了外交利益就应该牺牲经济利益，而应辩证看待国家利益并予以细化。同时加大在经济领域的内部协调力度，通过各领导小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制度等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实力资源，统一对外谈判立场。二是自下而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与世界关系的大讨论，以形成新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共识，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实力资源只有通过内外兼通的路径，才能稳步积聚和有效利用。

加强对外战略机制和平台建设。在与国外互动过程中，通过设立机制化平台，创造性地解决各类实力资源如何配合的问题。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是朝向实现经济资源与战略、政治资源有效整合的重要步骤，为中美双方的高层官员共同管理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平台。但目前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尚不能有效整合各类实力资源，战略轨道与经济轨道尚没有完全对接。为了推进未来十年中美关系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在元首层面达成战略共识，再交由战略与经济对话具体落实。在落实过程中，应实现政治与经济议题的结合，实现全面的有取有予。与此相类似，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领导人会晤机制等都是具备将各类实力资源整合使用的潜在平台和机制，但需要

不断改进完善，尤其是通过内部协调，明确国家利益，统一谈判立场，加强对外沟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上述战略机制将发挥基础性的平台作用，而战略机制的动力源泉依然是明确国家利益、凝聚国内共识、整合实力资源、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利益置换。



经济外交官回忆录



《经济外交官》作者简历：

尼古拉斯·贝恩大使，英国第二等高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士（Sir Nicholas Bayne, KCMG）。英国资深外交官、政府经济事务高官。他曾出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金融专员、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司长、英国驻经合组织代表团团长（大使），后升任英国外交部经济事务主管、八国集团峰会高官（Sherpa），最后出任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大使）。在任上，他就与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教授合写峰会外交一书；退休后，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精品课程——“经济外交”，出版《新经济外交》，广受好评，至今已推出第三版。



《经济外交官》内容推荐：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外交官回忆录。在长达35年的经济外交生涯中，尼古拉斯·贝恩爵士见证并参与了“七国集团”（G7）的诞生与发展，是世界上峰会外交和经济外交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完美地将经济外交实践与教学、科研融为一体，为经济外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外交官》为世界上经济外交、峰会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篇推荐文章截取书中四个精彩片段，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内容涉及“七国集团”由来、“峰会外交”的诞生与发展、“双层博弈”概念的提出、经济外交定义辨析、经济外交走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课堂以及经济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国际锡协定谈判。

一、“七国集团”的由来

摘自《经济外交官》第87-88页。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法国）享有比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政府首脑都要大的权力。作为前财长，他决心借助个人影响力，克服石油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经济危机。怀着这样一种目的，他于1975年向世界主要几个经济体发出呼吁，提出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召开非正式峰会。

当他还是财长的时候，德斯坦就曾参与过在白宫图书馆举行过的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财长非正式会谈。这类非正式会谈都安排在IMF会议同期举行。德斯坦对这种在图书馆内举行的无拘束的交流印象非常深刻。后来这种图书馆聚会被称为“G5”（五国财长会晤）。在成为法国总统后，德斯坦决心在他这个级别复制图书馆聚会。从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那里，他得到了热情的支持。施密特也是财长出身，两人仕途轨迹相近。1975年7月，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德国总理和英国首相在赫尔辛基会晤期间，原则达成一致，按照德斯坦设想的模式召开一次经济峰会，并邀请日本参加。但这一决定令美国财长比尔·西蒙很不以为然。他担心福特总统在那些专家出身的欧洲同僚面前处于下风。因此，德斯坦不得不同意各国领导人出席峰会时可以由其外长和财长陪同参加。德斯坦还很不情愿地喊上了意大利，以增加意大利政府在对抗意大利共产党时的政治资本，但他拒绝叫上加拿大。加拿大直到下一次峰会召开时才加入（译者注：随着加拿大的加入，经济峰会就正式成为“七国集团”，即“G7”；在1998年的伯明翰峰会上，俄罗斯正式加入，就形成了今天的“八国集团”，即“G8”）。



首届经济峰会于1975年11月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城堡举行，时值周末，还下着雨。盘旋的直升机一架接一架的鱼贯飞入，卷起地上的层层落叶，四散飞舞。英国代表团的工作间被安排在城堡中当年拿破仑的浴室，有着锌制的浴缸和天花板上了一幅幅庆祝拿破仑胜利的图景做伴。头天晚上，大家齐聚在城堡一个大厅中，等待主人的出现。德斯坦隆重登场，穿着羊绒套衫，牵着猎犬。他要在这里单独接见每一位与会的政府首脑。但看到大厅挤满了美国总统福特的保镖时，他很不满意。

当会谈开始后，德斯坦给大家吃了一惊。其实早在1971年以来，IMF内就在讨论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中如何接纳浮动汇率制。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IMF成员都提出，浮动汇率制应该和固定汇率制享受同等的合法地位。但法国坚持固定汇率制要享有优先地位。在上次的IMF会上，其他成员敦促法国和美国达成一致。此次会上，德斯坦指示其财长Larosière与美国财长Ed Yeo秘密达成一项双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法国将不再对浮动汇率制持保留态度。作为回报，美国和其他金融中心将在外汇市场出现异动时实施干预。这项秘密协定目前已经公开。

二、“峰会外交”专著诞生和“双层博弈”概念的提出

摘自《经济外交官》第109-111和116-117页。

英国外交部有一种很开明的做法。就是允许步入仕途中期的官员获得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前往世界知名学府或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并出版其成果。我有同事去了哈佛，我选择了呆在国内，去了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Chatham House）。早在外交部规划部门任职期间，我就与Chatham House研究部主任威廉·沃勒斯（William Wallace）保持很好的联系。在皇家国际关系学会的这一年，日后证明是我整个外交生涯中最惬意也是最受益的一年。我也与沃勒斯夫妇成为挚友。

在外交部经济关系司（Economic Relations Department, ERD）这样一个忙碌的司局，我必须处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没有时间进行深入思考。现在我想抽身出来，仔细思考一些涉及经济外交大势。我把研究主题定为“经济峰会”研究，这是我这些年来从经济峰会一诞生就一直亲身参与的活动，并且这方面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我提出研究这些峰会对政策议题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我的研究题目获得了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同意。沃勒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题目，他正好对峰会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题很感兴趣，并把我介绍给了美国哈佛大学

的学者罗伯特·普特南 (Robert Putnam)，他正好在 Chatham House 做暑期研究。普特南也在做有关经济峰会的研究，关注峰会对国内政策制定的影响。我们特别谈得来，都认为我俩的研究互补性很强，不存在利益冲突。

1982年11月，沃勒斯带着我去马斯特里赫特参加一个以峰会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和普特南都要在会上提交文章。研讨会期间，我和普特南交流峰会研究心得。有天晚上很晚，普特南找到我，提出要与我携手。他指出，我俩的研究方法互补，如果携手就可以对峰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还提议两人合写一本有关峰会的书。如果我们各自为战，那谁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我满怀激情地同意了他的倡议。

我们的书共分十二章，他写六章，我写六章，在叙述和分析之间交替切换。我负责的叙述章节包括我亲身参与的第一次经济峰会——法国朗布依埃峰会。他的叙述章节包括即将于1983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的峰会。我的分析章节包括我在外交部经济关系司期间处理过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及其影响，他的分析章节包括美国总统卡特的作用，他曾在白宫为卡特工作过。最后总结部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峰会外交的理论进行回顾梳理，第二部分是我对未来峰会外交的一些思考。

普特南给我们这本书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Hanging Together (同舟共济)”，这是源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签署《独立宣言》时的名言：“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most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 (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否则，我可以肯定，我们将被各个击破。译者注：“hang”在英文中有“吊”、“吊死”、“处以绞刑”的意思，“hanging together”直译就是大家捆绑(吊)在一起，而“hang separately”意思是分别被处以绞刑。富兰克林巧妙地运用双关修辞，通过词组搭配，活用了“hang”这个词，起到了较好的语义表达效果。)

在本书第一版中，普特南就用了“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的比喻，来形容政策制定者必须同时面对国内和国际两张棋局进行决策。国内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对国际谈判的成功至关重要。而老到的对外谈判者能借助国际谈判推进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在整个80年代，普特南都在研究和阐释这个“双层博弈”的理论，我俩也进行了一系列热烈的辩论。我通过自身的谈判实际经历，如国际锡协定谈判，论证了他的理论，而他把改进后的理论写入我们新版的“Hanging Together”。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更详细的学术文章，题为“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



普特南后来的学术成就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学者之一。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成为一名伟大学者所需要的一切特质。不仅是他的智慧，更有他的人品。他有很可爱的个性，人情味十足。他对别人的经历有着发自内心的兴趣和好奇，这使得别人愿意向他敞开心扉，一吐为快。在学术上，他开放诚实，能公正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争论。他绝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思考者，而是时刻希望看到他的想法和理论转化为现实。与他共事、合著峰会外交一书，让我的学术休假成为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

三、“经济外交”的定义和经济外交走入课堂

摘自《经济外交官》第208-210页。

书中我多次提及“经济外交”一词，但“经济外交”的提法在我供职外交部期间大家还不常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我退休后，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麦克·霍奇斯（Mike Hodges）那里听来的。他建议我俩共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一门名叫“经济外交”的课程。他将经济外交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就经济议题在国内进行决策，在国际上开展对外谈判。他认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进程值得做更多的学术研究，而最好的研究途径就是请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共同参与进来。我很乐意与他一起做这件事，这也使得我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学术根基。

当我从1997年6月丹佛峰会返回以后，麦克帮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谋到了一个访问学者的岗位。当时国际关系系包括威廉·沃勒斯（William Wallace）在内的大部分学者都是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方面的。我和麦克原先的计划是在1998年10月开一门新的名为“经济外交”的选修课。但到了1998年1月，麦克告诉我，他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引入一门新课程。作为过渡，我们开了一个十次的系列专题讲座，每次都由一个学者和实践者共同来给学生上课。

麦克不幸于1998年6月突然离世。我想我们此前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了。但麦克的同事不希望我们的课程项目随着麦克的辞世而终止。国际关系系的行政主管希拉里·帕克问我能不能一个人管理这个系列讲座。我说我需要学校出一名教师帮我，并提议由刚刚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斯蒂芬·伍尔考克（Stephen Woolcock）做我的搭档。早在斯蒂



芬在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工作时，我俩就相识。他是一个贸易问题专家。斯蒂芬同意与我携手做这件事。事后证明，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课程延续至今。第一眼看到斯蒂芬，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严肃和略带腼腆的人。但我俩在工作上很合得来。随着系列讲座越办越成功，斯蒂芬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随着系列讲座的成功，我们开始着手申请将系列讲座升格为学校的一门正式课程，课程从1999年10月开始起授，由斯蒂芬担任“课程总管”。我们胆战心惊地跟系里的几位教授开了碰头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来不承认经济外交是一门学术。但我们承诺在授课过程中加入更多理论内容，并且我早些年与普特南合写峰会外交的经历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就这样，这些教授最终同意我和斯蒂芬开设经济外交这门选修课。第一学期只有20名学生报名选修我们的课程，但实务工作者的授课吸引了大批听众。最终，我们的课程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世界经济政治学研究生专业的一门固定选修课。

这门课逐步形成由20堂教学(lecture)和学生研讨(seminar)组成的固定模式。斯蒂芬和我讲开头的几门课。第一堂入门课由我和斯蒂芬合讲。接下来斯蒂芬讲经济外交理论，我讲实务，重点是冷战后和全球化时代。关贸总协定的设立、早期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等都是我们使用的历史案例。紧接着我们请三位实务工作者分别从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三个角度做三次讲座。我在英国外交部的继任者柯林·巴德(英国外交部负责经济事务的局长)做第一个讲座。在这三次讲座后，我们将按照双边、区域和更为广泛的国际组织这三个角度继续请实务工作者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些授课人员包括来自高盛的马修·古德曼，他曾在美国驻日本使馆担任过金融专员，由他来讲授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外交。还有一位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他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外交。我还请来了英国首席谈判代表给学生讲述多边贸易谈判。还有一名欧委会的官员介绍欧盟如何开展对外环境谈判；一名英联邦秘书处的官员讲述经济外交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介绍债务减免问题。课程还包括学生研讨课，每次让两名学生做课堂陈述，并提交短文章，我们还要给他们打分。(译者注：这门课后来取得了巨大成功，报名学生超过100人。斯蒂芬不得不把每学期学生人数限制在75人左右，分成五组授课。该课程开设至今，译者有幸参与了经济外交课的教学。)

四、经济外交典型案例—国际锡协定续签谈判

摘自《经济外交官》第208-210页。

1982年是我在外交部经济关系司的第四个年头，最值得回忆的是国际锡协定续签谈判。英国过去一直是国际锡协定的缔约方。在旧的协定到期之时，英国面临是否要续签该协议的问题。工业部是这项议题的牵头部门。工业部的主管安妮德·琼斯坚定地认为英国应该反对续签。她算了笔经济账，认为该协议造成锡产品价格虚高，伤害了英国锡产品消费者利益，并且减少了对英国本土锡矿的需求，令英国损失惨重。她还预测，这个协定很快就会完蛋。我反对她的唯经济论调，指出这项协定已经运转了二十个年头，并且从政治上阐述了这项协定的重要性。欧共同体刚刚就大宗商品问题形成共同政策。如果英国反对此项共同政策，那欧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就无法加入国际锡协定，而这个协定也会因为失去了欧洲这个大市场而最终瓦解。这将疏远英国和欧共同体当中想加入该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影响英国和那些将商品协定视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影响到英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锡生产国，而英国恰巧和马来西亚因为一系列问题正在交恶。卡林顿外长明确指示我，不希望再和马来西亚有新的矛盾冲突。

安妮德和我开始在英国政府（白宫）内部寻找盟友、合纵连横。财政部、农业部和其它不喜欢商品协定的部门都站在了她那一边。但是贸易部，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CTAD）的发起部门，支持我。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续签事宜上升到了内阁部长委员会。国防部长站在了我这一边，因为他希望保住马来西亚的军火订单。但在内阁部长委员会这一层级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问题提交给了撒切尔首相拍板。形势初期不利于我。但在首相最终决定前，她和卡林顿外长恰好前往德国召开英德峰会。德国是欧共同体成员国当中唯一对续签锡协定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这对我更加不利。但卡林顿外长通过卓越的外交技巧，说服了德国外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根舍说服了德国总理施密特，然后施密特又说服了撒切尔夫人。最终，英国和德国同意欧共同体加入新的国际锡协定。新协定随之生效。但不出三年，该协定最终土崩瓦解，我不得不承认安妮德的经济观点是对的。但至少英国没有为协议的失败而承担骂名，因此避免了政治上的损失。

（张晓通摘译、整理）



经济外交环球资讯

美国下任国务卿推行更加注重援助、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对外政策

2013年1月24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克里(John Kerry)承诺，作为美国下一任国务卿，他将推进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愿景，减少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军事行动，推行更加注重援助、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对外政策。克里在开场白中说，总统奥巴马和在场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对外政策不是单靠无人机和军事部署就能定义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日本央行最近加速印钞，引发货币战担忧

发达国家央行，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一直在采取激进的举措，通过通货再膨胀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将导致其货币贬值。2013年1月24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当被问及货币操纵是否会导致不正当竞争时，默克尔表示，“我并非全无担忧。我不能说此刻我对日本毫无担忧。众所周知，我们德国的观点是，央行不是用来收拾糟糕政治决定烂摊子的，也不是为了解决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其采取更大胆行动以克服通缩，并帮助日本走出衰退。最近几个月日本央行扩大了资产购买项目，并于本周将目标通胀率定为2%。国际清算银行行长Jaime Caruana在达沃斯接受采访时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令本国货币贬值方面，各国央行面临“过度压力”。

韩国三星道达尔石化(STC)决定恢复采购伊朗石油

2013年1月25日，路透社报道，在中断一年后，韩国三星道达尔石化(STC)已恢复一项采购伊朗石油的合约，因塑化利润微薄，令三星道达尔难以抗拒廉价的伊朗石油。去年伊朗石油出口遭遇严重阻碍，包括对日本及韩国两大采购国的出口中断，但之后进口商已经找出方法，在不违反制裁措施的情况下，继续进口伊朗石油。根据计算，这项合约可能为三星道达尔省下多达670万美元成本。三星道达尔是韩国三星集团与法国道达尔的合资企业。法国外交部发言人Philippe Lalliot表示，将仔细研究法律层面，以了解是否符合制裁措施。

欧盟与美国自贸协定谈判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2013年1月26日，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Karel de Gucht)表示，美国和欧盟正在做双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最后准备工作。从规模上来讲，欧美贸易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经贸关系，欧盟与美国之间每天在服务和商品上的贸易就达到了18亿欧元，欧盟和美国的GDP加在一起占全球GDP的近一半，欧美双边的贸易流占据了全球贸易流量的近1/3。

德古赫特2月5日将走访华盛顿，为欧盟-美国的联合报告做最后润饰。他发出迄今最清楚的信号，称欧盟和美国对协议已做好准备。“实际上报告已准备好，我将赴华盛顿讨论一些细项和交换最后的看法，不过基本上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德古赫特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欧美自贸协定的拥护者称，两者之间的贸易协定将释放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跨洋生意。另外也让欧美可抢在中国和印度前头，界定全球贸易的规则。

日本2012年全年贸易逆差创纪录

根据日本财务省2013年1月公布的数据，日本去年全年贸易逆差创下6.927万亿日元（合783亿美元）的纪录，凸显了强势日元、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以及能源进口飙升对其制造业主导型经济的冲击。财务省同时公布，去年12月份商品贸易出现6,415亿日元逆差，主要反映了出口疲软和进口增长的影响。日本去年12月份商品贸易数据逊于预期。此前接受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wires)和《日本经济新闻》(Nikkei)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当月逆差为5,485亿日元，同比扩大208%。这也标志着该国连续第六个月出现逆差，为198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去年全年的贸易逆差较2011年的2.565亿日元增加了一倍多，2011年是日本自1980年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贸易逆差。

韩国央行首次动用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安排

韩国央行(Bank of Korea)在1月份表示，该行首次动用了与中国签署的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互换安排，向韩国外换银行(Korea Exchange Bank, 004940.SE)贷款人民币6,200万元。韩国央行在声明中称，韩国外换银行将把上述资金贷给希望用人民币向中国贸易伙伴付款的韩国企业。韩国央行表示，通过动用双边货币互换进行贸易结算，韩中两国企业将获

得稳定的融资，并减少外汇风险敞口和交易成本。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于去年12月份达成协议，同意从2013年开始动用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以促进人民币和韩元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韩国央行还在声明中表示，韩中两国将努力最终建立韩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为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提供便利。声明称，韩国还将寻求与发展中经济体达成更多货币互换协议，并为双边贸易付款提供所需要的资金。

中英两国央行准备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高级官员Chris Salmon在1月份称，英国央行准备与中国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此举将帮助英国实现将伦敦打造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宏伟目标。Salmon在向伦敦货币市场协会(London Money Market Association)执行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称，若双方能够敲定细节，英国央行将准备与中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Salmon称，英国央行原则上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央行达成互换协议，只要一个互相都能接受的形式得到确认。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意味着银行在发生危机时可以获得外币。英国央行已经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和其他一些央行签署了类似协议。

(赵柯 编译、整理)

《经济外交》第三期征稿启事

您好！《经济外交》杂志2013年4月号（总第3期）计划以“中欧关系”为主题策划一期专辑，于2013年4月底对外推出。本编辑部将与欧委会资助项目——“欧洲—中国研究与建议网络”（ECRAN）合作，双方各出一半文章，共同登载在本期专辑当中。拟推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鼓励作者以英文投稿。希望来稿涉及下列内容：

- 1、发展中欧关系的总体战略思路
- 2、2020年中欧关系：欧盟2020战略；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3、中欧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包括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及完善85协定谈判等
- 4、中欧经贸关系：如何实现中欧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与影响评估；中欧贸易决策和政策制定等
- 5、中欧双边投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企业赴欧投资
- 6、欧盟成员国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
- 7、中、美、欧三边关系及其发展

《经济外交》是双月刊学术电子期刊，部分稿件采取匿名评审制。每期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在国内外约稿，編集推出。每年设2期英文特刊。读者主要是政府部门、使领馆、商协会、企业、高校和媒体人士，杂志直接推送人群数量在10000人左右。

文章内容是有关经济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深度分析和政策建议。字数以2000-3000字之间为佳。如果您能不吝承允，请于2013年4月10日前提交稿件。我们将在第一时间通知您稿件是否被录用。稿件内容既可以围绕本期主题，也可以谈及经济外交领域的其它相关内容。

感谢您的支持！

《经济外交》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第3期责编：王宏禹

邮件地址：hongyuruc@gmail.com

联系电话：15120007637（王宏禹）、13910309412（张晓通）、13581645079（赵柯）

